

#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 秦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0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围绕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新命题。在主持这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实到位,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网生产生活、获取信息、社会交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渠道之一。商业平台凭借“数据—算法—流量”的机制,掌握着推送信息、设置热点议题、影响公众情绪与言论乃至塑造社会观念与行为的权力。它们不但掌握了触动社会心理与情绪的重要开关,更成为当前热点舆情生成的主要驱动力。但平台算法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有效的价值逻辑与法律监管,这影响了党从技术架构的源头掌握文化生态的主导权。”

## 信息技术发展给文化治理带来新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一场新的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球展开。能不能适应和引领互联网发展,成为决定大国兴衰的一个关键。”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各国间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世界各国纷纷将信息化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围绕网络空间发展主导权、制网权与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竞争与安全风险同时成为国际关注重点。在全球主要政治体推出的人工智能政策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唯一被同时列入战略重点和风险重点的技术类别。

在经济领域,新技术不仅重构了传统产业模式,更通过算力算法算网的竞争重塑了全球数字经济格局,并成为全球产业链争夺的制高点、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工具以及重构国际秩序的关键杠杆。在政治领域,信息技术的兴起催生了“网络主权”这一新型国家主权概念与战略空间,它超越传统地理边界,成为重塑地缘政治空间的重要力量。在文化领域,信息技术是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与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更在于构建了“技术—权力—空间”三位一体的新型地缘政治体系。未来,掌握信息技术主导权的国家将在国际秩序重构中获得结构性优势。

信息技术作为新一代基础设施与社会结构的技术基座,不断推动信息获取、社交、舆论、电子商务、娱乐等多元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互联网平台与资本共同驱动的内容生产模式互

嵌,催生新的经济业态与文化形态,在给社会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给党掌握文化领导权带来了全新的课题。提升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领域治理能力,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和定位,才能在发展与安全、管好与用好的平衡与统一中把握好“治理”的深层内涵。对此,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新课题:

一是网络平台中介化与“黑箱”化。当前,互联网商业平台日益成为网民生产生活、获取信息、社会交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渠道之一。商业平台凭借“数据—算法—流量”的机制,掌握着推送信息、设置热点议题、影响公众情绪与言论乃至塑造社会观念与行为的权力。它们不但掌握了触动社会心理与情绪的重要开关,更成为当前热点舆情生成的主要驱动力。但平台算法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有效的价值逻辑与法律监管,这影响了党从技术架构的源头掌握文化生态的主导权。

二是人工智能技术意识形态风险全流程化。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日益成为意识形态主战场。人工智能大模型所具有的内生性“全流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将在未来构成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其训练所用的语料库,可能存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偏差及其他被污染的风险;其产生的大模型“幻觉”,即虚假与错误信息的规模化生成,成为各类谣言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源头;大模型在训练和学习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可能被注入特定价值立场,进而影响认知框架的塑造。能否实现人工智能大模型内容输出的全流程可控,关系党主导舆论的话语权。

三是舆论引导与舆情处置面临新趋势。互联网时代,我国有超过11亿网民在同一个网络空间中获取与交流信息,当舆论密度与热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迅速演变为舆情,从而形成“信息传播—舆论聚集—舆情引爆”的效应。加之当前中文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不同政治力量与文化思潮争夺影响力与注意力的重要阵地,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也早已不复存在。能否建立和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成为党在文化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四是新兴文化业态IP化与粉丝化的双刃剑效应凸显。数智技术与商业资本的双重驱动催生出大量新兴文化形态与业态,如粉丝经济、直播经济以及短视频、网络文学等多模态的新大众文艺,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上下中下游产业链,并推动形成企业全球化成长的新范式。这些新兴产业形态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丰富公共文化供给、

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与创新活力,形成了新的“大众产销”与“全民共创”的经济形态与文化生态。但与此同时,其以粉丝经济为基础的IP运营模式,形成了以流量为核心的作品产销全链条机制,使网络平台通过流量分配权实质上掌握了产品分发权与生产流程控制权,影响甚至决定着哪些文化产品得以被创作、传播、消费,这给文化治理带来诸多新挑战。同时,文化创作的流量逻辑也强化了内容创作的同质化、浅表化、庸俗化现象。

## 以信息技术驱动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系统性提升

在信息技术迭代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升党的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应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系统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平治理模式。目标是通过善治、善管、善用网络平台,将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确保现实与虚拟、线下与线上两个空间中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畅通无阻。当前,需要将以内容治理为主的传统网络治理模式,升级为基于平台架构与算法治理的网络生态治理新模式。对平台架构与算法进行前置审核与监管,确保算法导向正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自主可控,从根源上解决算法“黑箱化”以及算法驱动下产生的“信息茧房”、诱导沉迷、操纵榜单、过度娱乐化等问题。同时,引导网络平台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纳入算法优先推送序列,以此夯实网络舆论生态与文化生态的技术根基。

确保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全流程可控。建立由多部门、行业、专家等联合组成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文化安全审核机制,对企业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明确指导,从而构建起人工智能大模型全流程意识形态安全框架。在形成版权共识的前提下,建立“主流文化语料库联盟”,打通囊括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一流出版社出版物、图书馆馆藏等丰富内容的优质语料,实现“优质语料库—大模型训练”的正向循环。

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建立健全双效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机制。《规划纲要》提出了“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旨在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通过双循环带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优秀文化企业和品

牌,推动文化繁荣,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此,要完善文化产业“走出去”的中长期规划与一揽子计划,推动文化产业规模化出海。深化文化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贸易主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国际竞争力,以全球市场竞争力带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探索构建“技术—艺术—文化”三位一体的新大众文艺评价与管理机制,将思想深度、艺术原创性等传统标准与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平台。《规划纲要》提出了“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媒体引导力”的要求,这意味着主流媒体“融合发展”必须根本转变,推动内容建设与网络管理、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整体相融。一是以数字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媒体生产传播。拓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创意策划、内容生产、信息处理、舆情分析等环节中的功能,重构媒体技术底座,驱动主流媒体系统性跃升。二是推动媒体融合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联动,形成互联互通、融合创新的发展态势,使各地媒体融合由局部探索转向系统集成。三是构建自主可控的新型传播平台。重点做好主流媒体内容数据、用户数据、公共数据的采集标注,并与政府的政务、商务等综合性数据资源及渠道优势相结合。在为用户构筑坚实可靠数据底座的同时,嵌入数字生活场景,满足用户信息与服务需求,潜移默化地实现以文化人、价值观塑造与舆论引导等目标。同时,推进“常态化新闻发布—日常舆论引导—舆情应急处置”一体化治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实现从“信息发布”到“治理赋能”的功能升级;完善日常舆论引导与舆情处置协同机制,通过主流媒体、政务新媒体等平台形成常态化信息发布、互动与反馈,畅通政府与群众的良好互动渠道;等等。

(原载5月25日《光明日报》)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0年整整一百年间,历代先贤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在文化方面历经从自负到自卑、自省的过程,但这些都是自发的。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自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文化走向自觉、自立、自强与自信。本文以从《讲话》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脉络,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揭示其演进逻辑与时代价值。

## 一、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觉:《讲话》引领文艺新生

五四运动后,中国文艺从启蒙走向救亡,但长期存在与工农大众疏离的问题。大批文艺工作者汇聚延安后,作品多带小资产阶级情调,语言晦涩、形式洋化,与群众严重脱节,革命文艺难以有效动员群众。1942年《讲话》的发表,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开启了中国文艺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新纪元。

立场、情感与功能的深刻转变。《讲话》明确文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文艺工作者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从精英启蒙者转变为人民服务者。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情感从小资产阶级感伤转向贴近工农兵,创作聚焦群众生活与革命实践。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艾青诗歌等作品,实现了思想情感的彻底转变。《讲话》确立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功能,摒弃“为艺术而艺术”的狭观观念,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成为文艺大众化的典范。

对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深远影响。《讲话》指引下的文艺创作直接服务生产劳动,秧歌剧《兄妹开荒》等作品鼓舞大生产运动,推动边区经济发展。《小二黑结婚》配合婚姻改革,《李有才板话》助力根据地乡村治理,解放社会生产力。《白毛女》等作品普及文化教育,唤醒群众阶级觉悟,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同时,版画、秧歌等民间艺术复兴,文艺创作成为根据地经济与文化建设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讲话》精神感召下,延安涌现《黄河大合唱》《王贵与李香香》等大批经典,形成“红色文艺”浪潮。文艺批评立足实践引导创作,理论阐释支撑文艺繁荣。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人民性内核成为中国文艺的核心生命力。

## 二、文化自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与曲折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进入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型的自立阶段,历经奠基、发展与挫折,为后续文化建设积累了经验与教训。

奠基与初步发展(1949—1956)。新中国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错误思潮,清除旧思想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同时,大规模扫盲运动大规模提升了识字率,文学、戏剧、电影等领域成果丰硕,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初步成型并实现其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探索与曲折发展(1956—196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双百”方针推动文化短暂繁荣,《红岩》《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涌现,基层文化建设成效显著。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文艺创作日趋单一,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凸显,文化发展遭遇阻碍。

严重挫折(1966—1976)。期间,左倾思潮泛滥,“破四旧”严重破坏文化遗产,文化生产陷入僵化,仅存“八个样板戏”。大批知识分子遭受迫害,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对外文化交流隔绝,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遭受挫折。这一阶段的教训表明,文化建设必须尊重规律、坚守包容,摒弃极端化倾向。

## 三、文化自强: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历史跨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领域拨乱反正,逐步确立文化强国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

文化复苏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初期,“二为”方向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方面推动社会改革开放,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涌入,也引发“全盘西化”思潮冲击,文化主体性面临挑战。随后“文化寻根”思潮兴起,思想界重新审视本土文化,文化自觉复苏。

体制改革与战略升级。2000年“文化产业”概念提出,2002年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文化市场活力迸发,电影、文学等领域精品频出。2007年提出提升文化软实力,2011年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文化成为国家发展重要支撑。

春晚现象透视。1983年央视春晚应运而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文化载体。春晚打破文艺创作禁锢,推动大众文化普及,迅速成为全民共享的年度文化仪式与新民俗,凝聚家国认同、传递时代精神。历经数十年发展,春晚不断融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成为展示文化成果、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自信的重要平台,在海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央视网新闻频道。

成就与挑战并存。文化产业增加值大幅增长,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点,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城乡文化差距缩小。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均、精品力作不足、文化走出去力度不够、网络低俗内容泛滥等问题,文化建设面临提质增效的新任务。

## 四、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飞跃与实践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应运而生,继承《讲话》精神与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应对网络时代文化挑战,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性飞跃。

时代背景与理论创新。移动互联网普及重塑文化格局,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蔓延,亟需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四大创新:将文化自信确立为“四个自信”的基础,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根本遵循。

实践突破与治理成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媒体融合纵深推进,主流媒体占领网络阵地;“清朗”专项行动整治网络乱象,净化文化环境;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打破西方叙事垄断,文化出海成效显著;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制度化,筑牢价值根基。这些实践传承《讲话》人民立场,创新网络时代文化建设路径。

现实挑战与未来方向。当前网络文化乱象、意识形态斗争、平台治理短板、青少年网络保护等问题依然存在。文化自信需在斗争中巩固,既要直面外部压力,也要正视内部不足,以守正创新推动文化持续繁荣。

## 结语

从《讲话》到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历经文化自省——文化自觉——文化自立——文化自强——文化自信的演进历程,核心是“为人民服务”根本立场的一脉相承与创新发展,体现了历史的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百年文化建设波澜壮阔,既有高歌猛进的繁荣,也有艰难曲折的挫折,遵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在螺旋式上升中不断前进。《讲话》奠定了党领导文艺的根本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则立足新时代,以文化自信为根基,指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历史昭示,文化兴则国运兴,唯有扎根人民、守正创新,才能铸就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伟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持续繁荣发展。

(作者单位: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 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求索与时代升华  
□ 唐秋宝 石春金

# 国家级非遗《啰啰咚》产业化发展路径展望

□ 李沛林 朱响林

非遗作为民族记忆的活态载体,是地域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的重要依托。然而,在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许多非遗项目,尤其是依托特定生产生活元素的民歌类非遗,普遍面临传承链条断裂、受众群体萎缩、传播方式滞后、与现代文化消费市场脱节等现实困境。监利市唯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秧田号子《啰啰咚》”,同样站在了传承与发展的十字路口。为推动其从侧重于抢救记录的保护阶段,迈向可持续、有活力的产业化阶段,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本文结合监利市的文化资源禀赋与区域发展实际,对未来《啰啰咚》的产业化路径提出系统性展望。

## 推动形式创新 让“老调”唱出“新声”

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基础上的焕新。确保《啰啰咚》在当代社会中被焕发新生,首要任务是夯实保护基础,并大胆推进其艺术表达形式的现代化转型,使其既不失本色,又符合当代审美。

一是夯实根基,推进系统性数字化保护。建议由文化部门牵头,联合高校或专业研究机构,组建涵盖音乐学、民俗学、数字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团队,深入柘木乡等核心流传区域,开展全面、深入的田野调查。调查内容不仅包括采集现存传承人的完整唱腔、曲目、唱词,还应细致记录与之相关的劳动场景、历史渊源、传说故事及演唱习俗。在此基础上,邀请代表性传承人参与,采用高标准音频、视频技术进行录制,完成精准的乐谱记写与译谱,最终构建一个集音视频、图文、谱例于一体的《啰啰咚》数字化档案库。该资源库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更是未来所有创意开发的“源头活水”。

二是大胆融合,探索音乐表达的当代化。在忠实保留《啰啰咚》核心音乐特质(如高亢的声腔、独特的节奏韵

律)及其蕴含的集体协作精神的前提下,积极引入现代音乐创作理念与技术。可与知名音乐制作人、作曲家合作,尝试将流行、摇滚、世界音乐乃至电子音乐元素与之进行创造性融合。例如,创作保留原生态演唱韵味,同时配以电子节奏与现代化编曲的新版《啰啰咚》,使其既具有听觉上的新鲜感,又不失乡土气息。此类改编作品可瞄准主流音乐平台进行推广,并可考虑与受年轻人欢迎的歌手或虚拟偶像合作,推出跨界单曲,有效扩大其在都市人群中的影响力。

三是跨界拓展,打造沉浸式舞台艺术体验。推动《啰啰咚》从田间的歌唱形式,升级为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策划创排以《啰啰咚》为主题的小型实景歌舞剧或情境演出,选址于监利具有代表性的稻田景观或传统村落。演出可融入现代舞的肢体语言、戏剧化的情节叙事,辅以精心设计的多媒体投影、灯光效果,艺术化地再现昔日秧田劳作的热闹场景与情感世界。通过这种视觉与听觉相结合、传统与现代对话的舞台呈现,极大增强《啰啰咚》的艺术感染力与观赏价值,使其成为一种动态的、可体验的地方文化名片。

## 拓展产业融合 让“歌声”转化为“效益”

非遗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有效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形成多元化的价值实现路径。

一是文旅融合,构建沉浸式农耕文化体验区。与监利市文旅发展规划深度融合,选择生态环境优美、农耕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如柘木乡的核心区域),打造“啰啰咚文化生态体验村”。核心项目包括建设“稻田剧场”,在真实的稻田背景中举行定期或节庆专场演出;设立“非遗传承工坊”,游客不仅可以观看,还可以在传承人指导下学习简单的号子唱段,

体验农耕韵律。围绕核心项目,配套发展主题业态:开设以《啰啰咚》文化元素装饰的“号子主题民宿”;研发推出“秧田菜系”“号子米糕”“农耕茶歇”等特色餐饮;开发农事体验活动(如季节性插秧、收割体验)。最终形成“观看演出—学唱号子—品味美食—入住民宿—参与农事”的一站式、沉浸式文旅消费链条,将文化资源直接转化为旅游收益。

二是文创开发,激活日常消费市场的文化需求。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开发系列化、时尚化的《啰啰咚》主题文创产品。例如,设计印有特色歌词、曲谱图案或农耕插画的T恤、帆布袋、手机壳等日用文创;开发以号子节奏、劳动工具为灵感的首饰、文具、家居装饰品等创意礼品;录制高品质的《啰啰咚》原声专辑、黑胶唱片或环境声音专辑,作为独具特色的“声音礼物”。同时,积极探索与数字内容产业合作,将《啰啰咚》的音乐元素或相关故事背景授权或植入到热门手机游戏、影视剧、动画片中作为背景音乐或场景配乐,使其在更广阔的数字虚拟空间中传播,接触潜在年轻受众。

三是教育研学,播撒非遗传承的未来种子。将《啰啰咚》的保护传承前置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与监利市中小学、职业院校乃至高校合作,共同开发适合不同学段的非遗研学课程教材与活动方案。课程内容可结合音乐课、美术课、劳动课及地方文化课程,通过组织学生参观传承基地、学唱经典片段、了解相关民俗、参与简易创作等方式,进行体验式、互动式教学。可设立“啰啰咚传承社团”,定期开展活动,并举办校园号子比赛,激发青少年对家乡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自豪感,为非遗的可持续传承培养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潜在的新生力量。

## 强化科技赋能 推动“乡音”走向“世界”

在数字时代,必须充分利用信息

技术和新媒体手段,突破地域限制,提升非遗的可见度、传播力与互动体验。

构建新媒体传播矩阵,扩大受众覆盖面。系统化运营《啰啰咚》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形象。在抖音、快手、B站、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定期发布高质量内容。内容形式可多样化:制作系列短视频,如“一分钟了解啰啰咚”“传承人教唱”“号子背后的故事”等;邀请传承人或知名音乐人开展直播教学、线上音乐会;拍摄制作微纪录片,深入讲述《啰啰咚》的历史、传承人群体的故事及其文化内涵。通过持续、有趣、有料的内容输出,结合平台算法推荐和互动活动,精准触达对传统文化、音乐、旅游感兴趣的用户群体,构建线上粉丝社区。

应用沉浸式技术,打造虚拟体验空间。积极探索前沿科技在非遗展示中的应用。与科技公司合作,利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技术,开发“虚拟秧田”互动体验项目。用户通过佩戴VR设备,即可“置身”于三维构建的监利水乡稻田环境中,360度感受集体劳作的场景,并与虚拟的歌手互动对唱。AR应用则可将宣传海报、产品包装等变为交互入口,用户用手机扫描即可观看短视频、聆听号子片段。这类项目不仅可用于本地文化馆的常设展览,还可制成轻量版应用程序供国内外大众下载,或作为特色展览参与国内大型数字文化博览会、线上文化交流活动,推动《啰啰咚》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实现全球化、数字化传播。

总之,推动秧田号子《啰啰咚》的产业化,绝非将其简单包装成迎合市场的商品,而是要通过现代理念与技术手段,让这一承载着集体记忆与地域认同的文化符号,重新焕发生机,以鲜活、动人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图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引发共鸣、赢得共情,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监利市柘木乡人民政府)